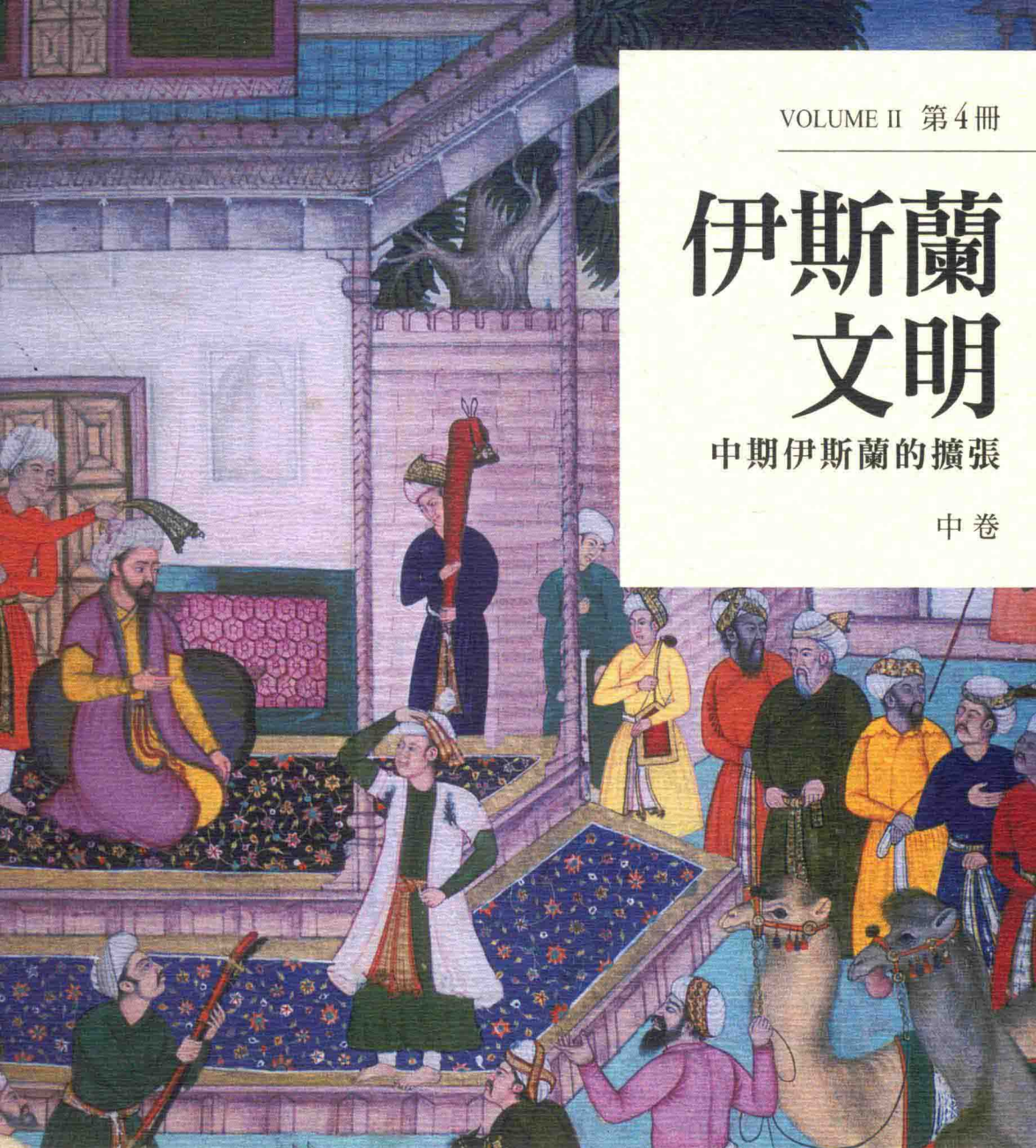


VOLUME II 第4冊

# 伊斯蘭文明

中期伊斯蘭的擴張

中卷



MARSHALL G. S. HODGSON

馬歇爾·哈濟生 著

審訂

THE VENTURE OF ISLAM  
THE EXPANSION OF ISLAM IN THE MIDDLE PERIODS



# 伊斯蘭 文明

中卷 中期伊斯蘭的擴張

第4冊

危機與復興：蒙古強權時代

MARSHALL G.S.HODGSON

馬歇爾·哈濟生 著

THE VENTURE OF ISLAM

THE EXPANSION OF ISLAM IN THE MIDDLE PERIODS

CRISIS AND RENEWAL: THE AGE OF MONGOL PRESTIGE

# 伊斯蘭文明

## 中期伊斯蘭的擴張 中卷第四冊

作者	馬歇爾·哈濟生 (Marshall G. S. Hodgson)
譯者	高慧玲
發行人	王春申
編輯指導	林明昌
營業部兼任 編輯部經理	高 珊
主編	王窈姿
責任編輯	黃楷君
封面設計	吳郁婷
校對	邱太乙
印務	陳基榮
出版發行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3150 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43號8樓
電話	(02) 8667-3712 傳真：(02) 8667-3709
讀者服務專線	0800056196
郵撥	0000165-1
E-mail	ecptw@cptw.com.tw
網路書店網址	www.cptw.com.tw
網路書店臉書	facebook.com/tw/ecptwdoing
臉書	facebook.com/tw/ecptw
部落格	blog.yam.com/ecp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16 年 01 月

定價：新台幣 1500 元（套書上下冊不分售）

THE VENTURE OF ISLAM, VOLUME 2: The Expansion of Islam in the Middle Periods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 1974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Arrang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ISBN 978-957-05-3026-1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目次

- 001 第四冊 危機與復興：蒙古強權時代
- 025 第一章 蒙古侵擾後的政治與社會 1259 – 1405 CE
- 103 第二章 知識傳統中的保守與謙遜 c.1258 – 1503 CE
- 205 第三章 伊斯蘭背景下的視覺藝術 c.1258 – 1503 CE
- 255 第四章 伊斯蘭的擴張 c.1258 – 1503 CE
- 320 參考文獻選讀
- 330 重要詞彙與人物表
- 344 地圖重要詞彙
- 357 索引

## LIST OF CHARTS

- 020 〔序言〕表1 伊斯蘭的中後期（西元1250～1500年）  
對照歐亞非世界事件  
The Islamic Later Middle Period, 1250 – 1500 CE, with Reference to  
Events in the Oikoumene
- 094 表1-1 蒙古強權年代（西元1258～1405年）以及帖  
木兒時期（西元1405～1500年）  
The Ages of Mongol Prestige, 1258 – 1405, and of the Timuris,  
1405 – 1500 CE

- 101 表 1-2 歐斯曼帝國的早期成長，西元 1300～1453 年  
Early Growth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 – 1453 CE
- 202 表 2-1 晚期的飽學之士，西元 1300～1506 年  
Later Learned Men, 1300 – 1506 CE
- 318 表 4-1 伊斯蘭在非洲與東南亞的擴張  
Islamic Expansion in Africa and Southeast Asia

#### LIST OF MAPS

- 056 圖 1-1 旭烈兀時期（西元 1255～1260 年）的蒙古勢力  
The Mongol Powers in Hülegü's time, 1255 – 65 CE
- 059 圖 1-2 十四世紀的地中海地區中部至印度  
The central Mediterranean through India, fourteenth century
- 079 圖 1-3 歐斯曼帝國的擴張，至西元 1503 年  
Growth of the Ottoman empire to 1503 CE
- 085 圖 1-4 帖木兒的征服行動，西元 1370～1405 年  
The conquests of Timûr, 1307 – 1405 CE
- 259 圖 4-1 伊斯蘭的擴張，西元 1250～1500 年  
The expansion of Islam, 1250 – 1500 CE
- 282 圖 4-2 馬來西亞與中南半島  
Malaysia and Indochina
- 287 圖 4-3 黑色人種地區  
The Sûdânic lands
- 303 圖 4-4 北部區域  
The northern regions

## BOOK FOUR

### 危機與復興

### 蒙古強權時代

CRISIS AND RENEWAL:  
THE AGE OF MONGOL PRESTIGE

她確實與羅瑞爭論許久，最後羅瑞繃起臉來，而且只會說：「我比你年長，知道的一定比你多。」即使不知道他究竟多大年紀，愛麗絲也無法容忍這種說法……——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

本冊主要聚焦於十四與十五世紀，並始於第三冊探討的中前期（如果需要界定起點的話），這個時期具有罕見的連續性，卻沒有太多完全嶄新的社會環境或歷史趨勢（儘管確實曾經出現過）。十三世紀是蒙古人入侵的時代，到了此時，國際性的伊斯蘭社會（Islamicate society）已經完全成形；蘇非道團（Sûfî tarîqah）組織完備，波斯文學也發展出最具特色的體裁，人們普遍期待軍隊統領（amîr）的統治，並定下伊斯蘭持續擴張的模式。國際性的伊斯蘭社會（Islamicate society）吸收了佔領穆斯林中土的異教蒙古人，並使他們改信，藉此展現出社會的力量，而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裡，伊斯蘭社會（Islamicate society）在絕大多數的層面上，繼續遵循中前期立下的路線發展。在這個時期，新出現且最為顯著的特點是連續性，而基本的社會創新則相對貧乏。此時，無論政治表述多麼不穩定，都進入了一個社會與文化生活的期待及表述相對穩定的社會（就如同城市定居社會的發展）。那麼，我們就能集中探討，在這種相對穩定的環境背景下持續存在的文化模式如何發展，並且運用保守主義來研究。

至少到目前為止，這樣的時期應該較為單調乏味。但它即使是保守主義的研究，仍然同時具有重要性及啟發性。這種研究的啟發性在於，讓我們得以驗證中前期所建立的模式沒有因為任何外來的元素，而變得複雜化，仍然得以完整運作。就像我主張的，如果確實有任何一個時期可以讓我們清楚看到伊斯蘭世界（Islamdom）作為一個社會所特有的特徵，中期正好就是這樣的一個時期，尤其這些特徵在中後期變得特別清晰。而毫無意外，伊斯蘭許多文藝領域的表現以及一些成為標準的典範，都可以追溯到這個時期。同時，伊斯蘭文明（Islamicate civilization）某些最傑出的人物就活躍於這個時期，並反映

出文明的延續性與伊斯蘭（Islamicate）特徵。

不過，若認定連續性與已經隱含於早前的創造性生命的意涵，得以完全（甚至根本性地）在這個時期開展，將會是錯誤的想法。在這個時期的歷史情境中，仍存在一系列的新元素。這段時期內，伊斯蘭的擴張相當穩定地持續進行，這樣的發展幾乎不知不覺地改變整體伊斯蘭（Islamicate）文化生活的預設。中前期的順尼社群（Jamâ'î-Sunnî）宗教綜合體，面臨種種猛烈的挑戰，這些挑戰來自復興的激進什葉派（Shî'ism）、蘇非主義（Şûfism）內部的極端主義傾向、哲學和智識層面上的獨立性，甚至還有新伊斯蘭律法（neo-Sharî'）的反動。新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來源，就是蒙古人的征服行動。前所未見的激烈破壞行動，摧毀了哈里發政權的殘餘勢力，更擊潰許多阿拉伯與伊朗城市，普遍消滅了工匠與知識分子具有深厚修養的傳統的載體。接著，這場征服行動促進與最遙遠且異質的各種文化（尤其是中國）接觸。透過引進政治、法律以及特別是藝術層面的新標準，蒙古人在這些層面對伊斯蘭（Islamicate）生活提出挑戰，而即使在蒙古人根本未曾涉足的領域中，對於這項挑戰的回應長久以來也為人所感。一直到了十五世紀末期，新動力才出現，而且甚至強大到在伊朗也足以面對成吉思汗（Chingzi Khân）蒙古的鬼魂而面無懼色。

當我開始撰寫這本著作時，我以我學到的知識認定在伊斯蘭的前三個世紀後，或明確地說，至少在蒙古人的征服之後，便來到一個停滯甚至是衰退的時期，當時幾乎沒有文化創新，而確實甚至連伊斯蘭世界內部所留有的文化成就程度也日漸衰微，直到又在現代的「覺醒」為止。然而我開始懷疑，就其任何一般或絕對的形式而言，這個論點能不能繼續存在，甚或就「最黑暗」的時期（例如西元1300～1450年）



而言，這個論點是否還能成立。我會主張，如果真的要談論伊斯蘭世界內部普遍的文化衰微，就必須區分兩個不同時期的兩種現象，而傳統的想法將兩者混為一談。在中後期有一段經濟緊縮的時期，突顯出中前期的某些潮流：經濟緊縮的程度不定，文化效果也不明確。在此之後，至少大約從西元1500年開始，就是經濟復甦的期間，也是文化與政治的輝煌時期，但仍然無法確定中後期的經濟緊縮獲得多大程度的彌補。接著，還有第二個衰微時期，開始於十七世紀，但在十八世紀時情況才變得嚴峻，這次的衰敗期起因於嚴厲的、世界歷史的新局勢，因此嚴重程度遠大於上個緊縮期。在比較伊斯蘭世界過去的榮光與現在的困境時，後者這段時期是相當適切的基礎。

中後期的衰退最多只能說不無可能，即使是最容易證實的、經濟繁榮的衰退，也並非一致或普遍的情形。至少按某些標準來看，在那幾個世紀裡，伊斯蘭世界的中土上的美學與知識意識的水準甚至有所提升（就算不是在地中海地區的某些穆斯林領土上也是如此，這些地區時常吸引歐洲阿拉伯語文學者的注意）。顯然正是中後期為十六及十七世紀顯著綻放的伊斯蘭社會（Islamicate society），奠定了新的制度性基礎，湯恩比（Toynbee）也因此能夠將中後期合理定位為創造出全新文明的時代，並稱之為「伊朗文明」（Iranic civilization）。在十六世紀（特別是十六世紀後半葉）伊朗的藝術與生活相關的面向中，我們能夠發現創造性的發酵，與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當代生活有著令人訝異的相似程度，並在十六世紀孕育出新的生命。伊斯蘭世界的「停滯」或「衰退」（如果在十八世紀之前真的曾經發生衰退），當然必須界定在中後期，不過，那個衰退期本身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新起點。

很遺憾，在各個伊斯蘭（Islamicate）歷史分期當中，最少被深入探討的時期就是中後期，特別是該時期的中土地區。研究現代國際事務的歷史學者們，通常不會將背景回溯到這麼早的時期，而儘管文獻學家對探究事物的起源充滿熱忱，卻也鮮少研究這麼晚的時期，除非是為了研究與西方直接相關的地中海沿岸地區，才會關注中後期。這個時期相關的詳盡研究如此稀少，在面臨針對該時期總體特色的判斷時，必須要保持懷疑的態度。針對本書中任何概括性的推論，都必須強調一點，提醒讀者比起西方的歷史，伊斯蘭歷史（Islamicate history）還未曾經過透徹的研究，也因此關於這個時期的概括性推論不外乎是憑藉學養所做出的推測。這本著作中一定也留有缺少深入研究的痕跡。《伊斯蘭文明》中卷第四冊之所以不成比例地簡短，一部分是因為還有太多資料未經分析。本冊所涵蓋的時間事實上並不比第三冊所描述的時期短，如果讀者們未能留意這一點，將會顯得未能綜觀全局。

## 世界性的危機

如果即使在這段限定期間內，也不能討論全面性的衰微，我們至少還能談談總體的衰微因素。事實上，這種情形不只出現在伊斯蘭世界，歐亞非舊世界（Oikoumene）的多數地區也是如此。伊斯蘭的中後期是經濟發展相對遲滯的時代，甚至普遍有退化的情形。（這並非唯一的例子顯示伊斯蘭世界就是某種世界歷史縮影，雖然各個世界局勢的部分在伊斯蘭世界呈現時會以不同的比重組成。）

在歐亞非三洲的城市定居地帶，十四、十五世紀似乎在每個地區

都有經濟擴張趨緩的現象。歐洲的城鎮數量雖然迅速增加，但其中許多城鎮卻停止擴張（不過，儘管步調較慢，新開拓的西方地區仍持續發展）。中國生產的鐵先前一度明顯增產，現在速度穩定下來，甚至有趨緩的情形。即使在印度也能找到衰退的痕跡——當時在富饒的恆河河谷，政府的收入已經無法支撐過去的金碧輝煌。在這段時期的中期，黑死病出現在這個半球，造成西元1346年至1348年間的大瘟疫，導致人口劇烈減少，而且許多地方歷經好幾個世代後，都未能完全補充人口。將近兩個世紀，某種世界性的蕭條反映在都市化的程度、貿易量、可資運用的社會資源，甚至純粹反映在人口數上。

這或許部分起因於蒙古人的破壞行動所帶來的後續影響。這些後續影響主要有兩個方向，直接影響曾受侵略的地區，也間接影響世界貿易的資源。如果有任何間接影響的話，其作用就是及於所受破壞程度相對輕微的西歐與印度，而在受到直接影響的地區，經濟衰退似乎最為強烈。無論如何，不管蒙古人可能曾經扮演何種角色，在分歧多樣的原因之中，必定有其一致之處，才得以產生一系列如此廣泛的現象。

顯然至少在這幾個世紀裡，許多穆斯林領土較不繁榮。在尼羅河（Nile）至烏滸河（Oxus）間地區，也就是伊斯蘭社會（Islamicate society）的中土地區，某些土地的人口數量與文化活動可能有顯著的衰退。無數的城鎮範圍似乎都縮小了，甚至倒退到如村莊一般的規模。事實上，偶爾會有新城鎮出現，但更常見的情形是到了中期末期，較早的伊斯蘭時代所熟知的貿易與學習途徑，早已變得微不足道，甚至消失無蹤，然而卻沒有任何核心地帶相應地起而取代之，或許在相當程度上，這兩個世紀見證了這種情形最大幅度的增長。特別

是到了西元1300年，比起以往在阿巴斯朝（‘Abbāsids）興盛時期的情形，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流域的繁榮確實遠遠更為低落。在中後期，埃及一位富有洞察力的觀察者甚至在那富裕的河谷見證了嚴重的貧困。對伊朗大多數地區而言，同樣的說法似乎也能夠成立。西伊斯蘭世界（Maghrib）至少在中前期，農耕區就已經開始顯著縮減。另一方面，絕大多數更晚近才伊斯蘭化（一般而言也不是那麼乾旱）的地區，似乎不受這類衰退所苦。

我們絕對不能貿然嘗試估算繁榮衰退的程度。我們太常只能取得零星的證據，而這些證據往往來自研究較為透徹的時期（無論是較早期或較晚期）裡較為傑出、在當時也較為繁榮的區域，但是關於特定地點衰退的情形，相關資料所指出的往往也只是指出商業活動與投資活動所在位置的改變，而不是總體的區域性衰退。當時繁榮的地區可能幾乎不為人知，更沒有人加以研究。而在經濟史中，因為我們也對其他時期一無所知，我們對中後期的無知也就更加惡化。

伊斯蘭世界在這個時期的經濟翻轉，伴隨著稱之為衰退的其他潮流，但在這裡，這個概念更未能定論。

## 保守精神

從現代觀點來看，文化保守主義可以視為所有現代以前社會的首要特徵。從這個觀點來看，就這些社會壓倒性的保守主義（他們稱之為「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而言，很難區分「文明化」的農業（agrarianate）社會與尚不識字的「原始」社會。探討引進任何新的基本制度時，運用受習俗拘束的文化模式所做出的詮釋顯然不可行，否

則有些人似乎就會打算認定，直到現代的前夕，保守的「傳統主義」精神在人類社會佔了上風，幾乎僅僅面臨偶然的零星挑戰；到了現代，理性的發展精神才取代了這種保守精神。所謂的習俗拘束則被視為一套得以解釋所有其他事物的觀點。我們先前探討伊斯蘭世界的國際性傾向時已經提到，用這種方式將所有社會分為「現代」與「傳統」兩個範疇的作法，將導致造成誤解的後果。（同時也讓某些作家使用「傳統的」〔traditional〕一詞，而將社會「受到習俗拘束」與「具有家長制度」兩種情形混為一談，因此他們以同一個詞彙，指涉心態與制度類型兩種不同的事物。）

對其他精通歷史觀點的人而言，現代以前「西方」的內部發展相當清楚，足以在這個地區排除這種雙重分類。但是，除了某些無可否認具有創造性的時期以外，他們通常以類似觀點看待其他未經仔細研究的文明。確實（以其特殊的西方想像為基準），這種作家能夠得到較好的發展，他們不只談論保守主義或傳統主義，甚至常常談到西方以外的所有文明顯而易見的衰退。

正如我們進而考量科技性的現代性（technicalistic Modernity）對伊斯蘭世界的衝擊時所將發現的，要回答什麼是現代性獨有的關鍵特徵，這兩種觀點都會導致誤解。技術主義的現代性不單只是跳脫習俗的理性解放，也不只是西方傳統特有的傾向進一步開展的結果，而是已經自成一類的文化變遷。然而，就伊斯蘭中期的研究而言，更重要的是，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其中任何一種觀點都將導致我們對農業（agrarianate）層次文化本身的運作過程產生誤解。就文化傳統的本質而言，傳統必然為了生存而持續變遷。逐漸改變的環境會強迫人們接受這些條件，除此之外，文化對話的內在動力也同樣可以促使人們接

受，使原本在傳統中潛藏於創造性時刻的意涵得以開展。我們已經看到，伊斯蘭文化（Islamicate culture）正處於持續且範圍廣大的變遷與發展過程，不只在最初出現的繁盛時期如此，在後續文化日漸成熟的期間更是如此。任何保守主義的理解方式都必須視之為這段過程的一部分。

但是，認為現代以前的時期保守封閉，這種觀點也有其道理，如果仔細分析也相當有價值。換句話說，與許多現代的「進步」觀念相反，農業（agrarianate）層次社會中最正常的文化變遷步調都十分緩慢，且往往不受歡迎，而且只有部分能夠延續下去——甚至在獲取其他立足點的過程中，某些暫時性的立足點通常會消失。文化變遷的速度只有在例外的情形才會加快腳步，進入創造性的全盛時期，但變遷也只有在外例的情形才會減緩，轉變成所謂的停滯，或者倒退為所謂的衰微。而我認為，許多學者嘗試研究伊斯蘭文明（Islamicate civilization），特別在研究其較晚時期的過程中，會犯下致命的錯誤，那就是他們未能區分常態性的保守主義以及所謂的停滯或衰退。

現代西方人建立的「西方」歷史形象具有三個特徵，特別掩蓋了農業層次（agrarianate）的一般保守主義模式。西方領土本身的歷史可以直接回溯到最早的高盧人（Gaul）以及他們在西歐的祖先，而這段歷史已經被帶有偏見的虛構故事取代了：將地中海東部希臘歷史的某些全盛時期與後來歐洲西北部拉丁人的歷史，結合為同一系列的歷史事件。這種合成的想像導致人們產生一種印象，認為西方歷史不斷大幅進步，一方面因為西方歷史納入地中海東部地區的方式，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詮釋西歐成分的方式，由於缺乏世界歷史的洞見，不論是邊境地區（也就是所謂早期的西方）迅速但多是依靠外力得來的進展，

或發生在晚期西方新的內部發展，西方人都以同樣的方式一概描述為「進步」。最後，既然現代技術主義的重大變遷發生在西方，人們認為此一事實只是延續並確認了「西方」長期的「進步」。因此，在人們研究得最透徹的領域中（也就是農業〔agrarianate〕社會），真相遭到掩蓋，而保守精神正賦予了這個時期特色，但卻未在一般性的歷史基礎上受到賞識。

這種詮釋的形式無法適用於伊斯蘭歷史（Islamicate history）。相反地，正如我們已經看到，有些作法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們任意將希臘史的某個時期附加於西方歷史的作法相類似——也就是抱持種族觀點的文獻學家，將哈里發盛期的歷史斷然地與前朝的薩珊帝國切割，而加深了人們錯誤的印象，認為早期的伊斯蘭時代突然就大鳴大放了起來，而這也似是而非地讓往後的時期相較之下看似衰退。基於這項以及其他外來的理由（本書在別處指出其中多項），要發現伊斯蘭歷史（Islamicate history）常態性的保守主義本質，也同樣困難。回應著西方進步的印象，晚近伊斯蘭文化（Islamicate culture）的普遍衰退成為學者和普羅大眾的共同印象。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可以在事件表（見〔序言〕表1，第20～24頁）中概括呈現，這些事件使人們產生「晚期的伊斯蘭世界處於衰退階段」的觀念。至少在目前，不能說後來的伊斯蘭世界完全沒有衰退，但直到消除無端產生這種印象的錯覺之前，我們無法極其認真地看待這種衰退的論點。

無論如何，首先人們必須理解常態性的保守主義，以及表現在其中的保守精神。我們必須牢記，即使在創造力的偉大全盛時期，「舊世代」時間觀——認為年輕世代大不如前——通常就是最常被接受的態度。而有待解釋的不是這種態度，而是這種態度的例外，這樣的例外

偶爾見於地中海地區、伊斯蘭世界，也同樣見於現代以前的西方。<sup>1</sup>而且人們可以預期在任何時代，只有一定數量的傳統能有顯著發展，有時也沒有其他具有潛在重要性的新發現能夠接續，這悲傷的情況同樣發生在古代地中海地區、伊斯蘭世界，以及現代之前的西方，而其他傳統更可能實際遭受損害。應該視為特殊現象而加以解釋的，是文化的所有或多數面向皆同時繁盛發展的情形，但無論文化多麼盛行，保守主義不是存心只想扼殺理性變革、盲目的不散陰魂。相反地，保守精神本身就是嚴肅理性評估的元素之一，時常顯著地引導每個世代的領導階級。

仍被採用的文化傳統的本質，確保每個世代必須做出自己的抉擇，這個抉擇必須根據社會中某些特定團體的實質利益，也就是那些有地位能夠為所欲為的群體。推測這樣的團體享有何種利益時，不能只考量手上的物質資源，還須考慮文化資源，而文化資源包括潛在的

---

1 人們往往引用「舊時代」的時間觀，來證實文化衰退的存在，一如 Robert Brunschvig 在 'Problème de la décadence' in *Classicisme et déclin culturel dans l'histoire de L'Islam*, ed. R. Brunschvig and G. E. von Grunebaum (Paris, 1957) 裡有趣的討論。對我來說，只在能指出這種想法別具效用的情形下，這種引用才能表現其獨到之處。Brunschvig 在一篇關於西方所抱持的伊斯蘭 (Islamicate) 衰退觀念的歷史評論中，提出一件事實，他指出在十七世紀末以前，西方人不曾談起伊斯蘭的衰退。正如我後文所述，我認為這個時間點對整體的問題而言，比人們所理解的還要重要得多。順道一提，Brunschvig 與 von Grunebaum 編纂的整部著作對保守主義的問題具有重大價值，儘管在我看來，該部著作的一系列前提預設有許多瑕疵，而不利於後半部更全面性的結論。 *Unity and Variety in Muslim Civilization*, ed. G. E. von Grunebau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一書也處理某些相關的問題。



領導者必須具備的那種預期，去預測其他人各自會如何回應某些事物。正是藉由這種形式，過去的慣例與習慣得以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但這個角色相當侷限，甚至並不穩定。現代以前無數的抗爭行動，譬如伊斯瑪儀里派（Ismâ'îli）的那些行動，他們以實例說明，一旦人們確信新的立場對自己有利，而且確實也能夠取得那些利益時，一般人也會願意激進地採納新的立場。保守精神盛行之時，便在絕大多數情形下非常實際且實用地反映出一些事情，如特定社會中可以利用的投資、容忍範圍內的風險程度，以及肩負責任的個人對於事物的可行性或能否得到報償的認知。

我們必須承認，保守精神不只是針對特定行動的謹慎整體評價。保守精神所提出的預設立場是，重複採行舊有方法是最好的做法，舉證責任須由潛在的創新者負擔，而且變遷實際上經常是墮落而非改善，這樣的保守精神作為一種整體氛圍，得以在任何精細的評估開始之前，就能影響任何決定中的關鍵層次。然而，即使作為整體氛圍，保守精神也能夠發揮極其重要的社會功能。在農業（agrarianate）社會中，幾乎所有社會團體，包括村莊、地方工匠行會，甚至是所有城鎮，都必須在以現代觀點來看完全孤立的狀態下活動。如果犯下任何重大的失策，這些團體可能輕易失去所擁有的一切，更無法從頭來過。舊世代的時間觀即認為較年輕的世代缺乏經驗，總是處於毀掉每項事物的邊緣上，這樣的時間觀在某種程度上情有可原。光是堅守個人固有的事物就已經夠困難了，任何改善充其量都只是推測性質，不具實用性。即使是在最具革命性的時期，我們必須認知到，保守精神理所當然潛藏在所有農業（agrarianate）層次的歷史之下。但很大程度上，歷史的現實會在絕大多數的時期中阻礙這種精神完全發揮作用，